

doi:10.3969/j.issn.1674-7100.2014.02.009

# 原始陶鬻考释

张北霞

(湖南工业大学 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 在诸多的原始陶器遗存中, 陶鬻以其特殊的造型而分外引人注目。从字的象形意义上来说, 甲骨文中的“鬻”可能是陶鬻这类器物最原始的符号; 在造型上, 原始陶鬻酷似鸟形, 具有明显的仿生特点; 从材质和功能上看, 多数原始陶鬻有可能是给水加热的器具。其造型与实用功能与现在流行的电水壶设计出奇地一致, 这是设计学中“形式追随功能”的明证。

**关键词:** 原始陶鬻; 仿生造型; 实用功能

中图分类号: J5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7100(2014)02-0045-05

## Researching on the Primitive Pottery Gui Vessel

Zhang Beixia

(School of Packaging Design and Art,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The pottery Gui vessel has become the center of attention of all primitive pottery for its special design of modeling. From the meaning of pictogram, the picture “鬻” could be the most primitive symbol denoting the kind of utensils like the pottery Gui. The modeling of the primitive pottery Gui has displayed a bionic characteristic as it looked like a bird. In the aspect of material and function, most of the primitive pottery Gui could be the utensil used to heat the water. Its modeling and function are surprisingly consistent with the design of current popular electric kettle, which is the clear proof of “form following the function” in design.

**Key words:** primary pottery Gui vessel; bionic form; utilitarian function

### 1 陶鬻概述

在诸多的原始陶器遗存中, 有一种陶器造型非常特殊, 它既像鬲, 又像罍, 还似乎和夏商时期的青铜爵有着某种联系<sup>[1]</sup>, 考古学研究者最终依据《说文·鬲部》中对“鬻”的解释, 将其定名为“陶鬻”。陶鬻最早被发现于1930—1932年发掘的山东龙山城子崖遗址, 据1934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表的《城子崖》发掘报告称: “此类初出土时, 同人皆呼为罍, 及细检视, 殆不尽合; 罍无流此有流, 一

也; 罍有柱此无柱, 二也; 罍饮器不可炊, 此有灼痕, 三也。《说文·鬲部》: ‘鬻, 三足釜也, 有柄, 喙。’喙即流, 柄即罍, 此类具三足, 有流有罍, 与此正合, 故改之为鬻。然名者实之宾, 彼石器时代之民, 究竟叫鬻呼罍, 抑非鬻非罍, 不能起古人而问之, 为便于称谓计, 故名为鬻而已。”<sup>[2]</sup>自此, 这类原始陶器始被定名。此后, 此类遗存物的考古发现逐渐增多, 并成为研究史前文化以及夏、商文化的重要实物。

收稿日期: 2013-10-04

基金项目: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1JD21)

作者简介: 张北霞(1979-), 女, 甘肃武威人, 湖南工业大学讲师, 硕士, 主要从事设计艺术学史论的教学与研究,

E-mail: zbx111\_79@163.com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陶鬶分布很广,“在我国各地,东起海滨,西至陕西,北自辽东,南达岭南,已有上百处遗址出土了各式陶鬶”<sup>[3]</sup>。对其起源和发展的主流看法是:起源于海岱地区,然后向周围传播。但据台湾艺术大学吕琪昌先生的研究,陶鬶应该发源于太湖地区<sup>[4]</sup>。

从材质来看,陶鬶主要有白陶鬶、黄褐陶鬶和黑陶鬶几种。从造型来看,目前出土的陶鬶虽变化丰富,但共性特征明显,即:圆口,有流,有颈,三袋足,有釜,且釜和流在一条直线上,而陶鬶千变万化的造型就是这些主要构成元素的不同排列组合而已,陶鬶的具体变化形式如表1所示。

表1 原始陶鬶造型变化表

Table 1 Modeling change table of Primitive pottery Gui

| 部位 | 变化形式                   |
|----|------------------------|
| 流  | 冲天流                    |
|    | 短直流                    |
| 足  | 实足                     |
|    | 无腹 细长                  |
|    | 有腹 粗短                  |
| 袋足 | 小袋足                    |
| 颈  | 细长                     |
|    | 短粗                     |
|    | 漏斗状                    |
| 釜  | 上端连接至颈部下方<br>上下端均连接在后足 |

陶鬶的造型是原始陶器中结构相对比较复杂的一种,这种造型应该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原始人类在长期的造型经验积累之后创新的结果,同时,其造型也具有深刻的仿生意义。图1所示为山东滕州北辛庄出土的白陶鬶(图片来源:《中国陶瓷全集·卷一·新石器时代》)。



图1 白陶鬶  
Fig. 1 White pottery Gui

## 2 陶鬶的字形

从目前普遍的认识看,原始时期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只有一些简单的记事符号和图画。而中国的文字由图而生,这一点已经被现存的甲骨文所证实。从原始社会晚期到商代,陶质器物的造型有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即各种器形或者被继承,或者有演进,因此,在缺乏更早的文献资料时,只能在已发现的甲骨文中找寻与陶鬶造型相关的象形

文字来确定陶鬶的字形。

甲骨文中有几个与陶鬶器型有关的字,如鬶、爵等,鬶、爵分别写做“𩚑”“𩚒”,这二字显然都是从造型图画而来。有字即有形,只是在传承了几千年之后,字和器物的“形”逐渐分离了,因而现在人们只能从图像学的角度去重新认识其对应关系。

“鬶”作为一个复合字出现较晚,用其命名原始器物完全是现代人的行为。在甲骨文中,“鬶”字的下半部分(即部首“鬶”字)的写法有多种形式,其中之一为“𩚑”。显然,这个字形就是一个三足器物的侧视图,而且三个足是中空的袋状足,这一点和鬶的足部形状一致。同时,“𩚑”这个字形的上端没有封口,说明这是一个敞口的器物,正符合目前已经得到普遍认可的鬶的造型。在甲骨文中,大多数鬶部的字形都是以“𩚑”为主要构成部分,如“𩚒”“𩚓”“𩚔”等,可见,“𩚑”应该是鬶在甲骨文中无可争议的写法。

在甲骨文中,还有一些目前也被释为“鬶”的字形,如“𩚕”“𩚖”。吕琪昌先生在《也说“商”》一文中认为“其细长的颈部鬶形显然不类,很可能部分‘鬶’字也是源自于对陶鬶字形的假借,或也有误释的可能”<sup>[5]</sup>。在文章的注释中他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从篆文、金文上推,‘𩚕’应确是‘鬶’字。但是,若从与鬶形器物相对照,其颈部似乎过于细长,与其它鬶字如‘𩚑’、‘𩚒’、‘𩚓’等显然有别,反更近于现今所谓‘陶鬶’的形式。”<sup>[5]</sup>吕先生的分析是有道理的,“𩚕”和“𩚖”这两个甲骨文字形和鬶字的字形“𩚑”相比,下部几乎相同——都是表示3个袋足,但是上部差别较大,颈部加长,有一横封口且两边出头,这显然不像目前公认的鬶的造型,而应该指代一个在鬶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但比鬶的造型更为复杂的器物。

这两个字形到底代表什么器物,目前来看,至少有3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鬶(即鬶和甗的组合型器物),第二种可能是鬶和釜的组合型,第三种可能就是鬶。从实物造型来看,鬶和鬶这两种器物无疑都是由鬶发展出来的器型,但是,它们的实用功能和体量大小完全不同。徐中舒先生在《甲骨文字典》中所列“鬶”字的甲骨文有“𩚑”“𩚒”“𩚓”<sup>[6]</sup>3种写法,从字形上比较,如果没有新的器型被发现,吕琪昌先生提到的“𩚕”“𩚖”二字应该更有可能代表的是鬶或鬶和釜的组合型,而不是鬶。同时,《甲骨文字典》中的鬶部有一个字形“𩚔”,在众多的鬶部字形中,它显得很特别,下部为鬶形,上部造型似前有

流,后有鬶,与鬶的造型相符,而字典中对它的解字为:“象有喙可以泻流之高,疑即鬶字。”因此,从字的象形意义上来说,“𪛗”才可能是鬶这类器物的最原始的符号,有流和鬶是它在造型上与高最显著的差别。

### 3 陶鬶的造型

陶鬶采用的是仿生造型,这已经是现在诸多研究者的共识。《礼记·明堂位》记载:“灌尊,夏后氏以鸡夷(彝),殷以斝,周以黄目。”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很早就提出:“……鸡彝这种灌尊就是夏文化中的封口盃,也是龙山文化中常见的陶鬶。如果我们看看山东龙山文化中常见的红陶鬶,不用解释,就会想到这件陶器活像一只伸颈昂首、伫立将鸣的红色雄鸡。其实不独鬶如此,夏文化中常见的封口盃又何尝不像一只黑色或灰色的雄鸡!原来它们可能都是由共同的祖型——大汶口文化的鸡彝发展来的。”<sup>[7]</sup>山东潍坊姚官庄出土的橙黄袋足陶鬶就是这种鸟形仿生的典型代表(如图2所示,图片来源:《中国陶瓷全集·卷一·新石器时代》),该陶鬶恰似一只昂首挺胸的雄鸡,巍然而立。邹衡先生将鸡彝、封口盃与原始陶鬶联系起来,认为这三者的造型都是“雄鸡”的仿生造型,因为在上述三者的造型中都能找到与“雄鸡”相似的地方,自上而下,分别对应:流——喙;颈——颈;腹——腹;足——足;鬶——尾。



图2 橙黄袋足陶鬶

Fig. 2 Orange pottery Gui of pocket foot

陶鬶不仅在造型上具有仿生的形态,在装饰上也体现出一定的鸟形特征。在龙山文化出土陶鬶的流根处,经常发现一种圆形泥饼状的装饰,这种泥饼有时还出现在陶鬶的前腹部和鬶的上下连接处。对此,安立华在《陶鬶象形初论》中提出了他的看法:“龙山文化时期,有一种圆形泥饼常被装饰在陶鬶各个部位,特别是在口沿与流交界处的圆形泥饼装饰已形成固定形式,它是否就是鸟形器陶鬶的‘点睛’之笔呢?青州市赵铺遗址出土一件陶鬶,在口沿两侧不安装凸形泥饼,却代之以圆形镂空,更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sup>[8]</sup>

陶鬶不仅在造型上具有仿生的形态,在装饰上也体现出一定的鸟形特征。在龙山文化出土陶鬶的流根处,经常发现一种圆形泥饼状的装饰,这种泥饼有时还出现在陶鬶的前腹部和鬶的上下连接处。对此,安立华在《陶鬶象形初论》中提出了他的看法:“龙山文化时期,有一种圆形泥饼常被装饰在陶鬶各个部位,特别是在口沿与流交界处的圆形泥饼装饰已形成固定形式,它是否就是鸟形器陶鬶的‘点睛’之笔呢?青州市赵铺遗址出土一件陶鬶,在口沿两侧不安装凸形泥饼,却代之以圆形镂空,更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sup>[8]</sup>

在原始器物造型中,仿生形并不少见。在陕西华县曾出土了一件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器物——陶

尊,它的造型俨然就是一只体态健硕、目光敏锐的猫头鹰。丰肥的双足和尾部构成3个支点撑起整个尊体,鹰的头部刻划手法细腻,形象逼真:凸起的双目炯炯有神,且目光犀利;向外挺出的喙部既尖锐又有流畅的曲线,和整个头部自然地衔接在一起。制作者用了极其写实的手法塑造形象,甚至连其上下喙部的结合都塑造得非常严密和细致。与此相类似的例子还有在山东胶县三里河出土的兽形鬶(如图3所示,图片来源:《考古》1977年第四期)和猪形鬶(该陶鬶已四足残缺,如图4所示,图片来源:同图3)和山东泰安市大汶口出土的鬶类器,图5所示为狗形鬶(图片来源:同图2),有人将这类器物统称为兽形鬶。它们不仅是具象仿生的证据,而且它们的存在还说明:原始先民可以从自然界接触到和认识到的任意物种中获取造型的灵感,并用智慧加以创造,通过他们灵巧的双手塑造出一个个生动美观而又方便实用的器物。这些造型独特而又美观的仿生形器物无疑是原始器物中的精品,它们说明将具象的动物形象和器物造型相结合是原始先民主要的仿生造型手法之一。

对比这些仿生造型的器物,原始陶鬶的仿生形态已然不是那么明显,只能说它的造型酷似鸟或雄鸡,它的流似喙,鬶似尾,足、腹、颈也源于鸟形,但是,它的造型已经基本脱离了鸟形的原貌,是一个能够体现设计意识的独立“产品”和生活“用品”。在有些陶鬶口沿处的圆形泥饼状或圆形镂空状的装饰,被认为是陶鬶上的“点睛之笔”,但此说的前提是将整个陶鬶的造型想象成鸟形。因此,陶鬶的仿生造型已经不是一种具象的仿生,而是凝聚了原始先民智慧并体现其创造力和造型能力的器物。它盛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一时期是一个历史过渡时期,而原始陶鬶本身也是中国器物造型史上的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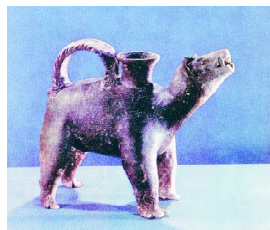


图3 兽形鬶

Fig. 3 Zoomorphic Gui



图4 猪形鬶

Fig. 4 Pottery Gui with pig for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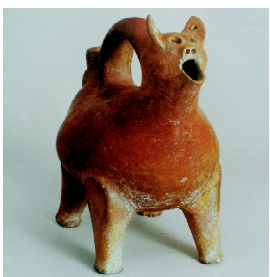


图5 狗形鬶

Fig. 5 Pottery Gui with dog form



过渡造型。如果说它造型的形成有仿生的因素，那也只能说它是一种抽象的仿生造型。

#### 4 陶鬻的实用功能

在众多的原始陶器中，陶鬻的造型可谓独树一帜，这也引发了众人对其功能的诸多猜想。陶鬻的造型似鸟，于是有些学者分析了它的象形意义，认为它是以鸟为图腾的部落的祭祀器皿，具有崇高的精神功能<sup>[9]</sup>；也有学者分析认为，陶鬻是商代流行的酒器——爵或斝的原始形态<sup>[10]</sup>。

其实，对于陶鬻功能的讨论，从根本上而言，就是要讨论陶鬻起源中精神功能和实用功能孰轻孰重，即这两种功能谁占了主要地位；或者说，原始陶鬻的出现究竟是出于原始先民的精神需要还是实际生活的需要。

台湾学者吕琪昌先生在对史前陶鬻进行多年研究之后，得出“爵、斝皆源自于陶鬻的观点”<sup>[1]</sup>。爵和斝都是商代典型的酒器，从造型上看，都可能具备饮酒和温酒的双重功能，爵多数用于饮酒，而斝的温酒功能更突出。此外，还有一种饮酒器——角，造型也和爵、斝类似，同样属于陶鬻的衍生器物。然而，拿商前期的青铜斝（如图6所示，图片来源：<http://baike.baidu.com/albums/8714782/8688503/0/0.html#>）和图2所示的大汶口文化中的陶鬻来比较，两者在造型上颇为相似，而且正如吕琪昌先生所分析的，青铜斝上的双柱似乎就是由陶鬻上的双层口或“鸡冠形装饰”演变而来。这两者在造型上的相似，不仅可以说明这两种器物在中国器物发展历史上有亲缘关系，而且表明它们在实用功能上具有一致性。



图6 饗饗纹袋足斝

Fig. 4 The bronze Jia with Tao-tie design and pocket foot

虽然爵和角的造型与斝相似，也和陶鬻一脉相承，但鬻、斝与爵、角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鬻和斝在与釜相对的口缘上有平口捏流，而并非像爵、角一样流和釜成直角而布。这个造型上的差异应该

源于它们各自功能的需要，因此，从造型出发可以推测出它们不同的用途：爵和角是饮酒器皿，爵的口沿一端是长流，另一端是尾，右手持爵，饮酒时流自然对准嘴部，正如我们今天拿带把手的杯子饮水，虽然杯口没有流，但喝水的位置在把手90°左右的地方，断无人非要转到把手的对侧位置去饮水，那样既不雅观又不舒适。而角的口沿两端是对称的尾，任一端的尾都可以充当流，左右手都可使用，比爵使用的姿势更加自由。

陶鬻的流与釜处于一条直线上，而如图4所示的斝虽然没有像爵一样的槽形流，但双柱之间的口沿应该是液体流出的位置，这个位置与釜相对，这说明陶鬻和斝都非自饮之器物，其使用方式应和现代的壶一致。鬻和斝又都是三袋足，下部可以迅速加热，因此，斝应是温酒器皿，将酒加热后倒入其它饮酒器中饮用，这应该是对斝的使用方式的最好解释，陶鬻的使用方式也应与此相似。

那么陶鬻是否也是酒器呢？如果是，说明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过滤后的液态酒，而且人们已经知道将酒温热饮用。从功能上讲，原始陶鬻并没有特别的造型设计可以显示其只能作为酒器，因为在当时比酒的使用更为普遍的液体是水。因此，对于原始陶鬻的使用功能，可以有另一种猜想：陶鬻是原始时期用来给水加热的工具，类似于今天壶的功能。原始先民在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后发现饮用热水和食用熟食的好处，于是创造出了加热食物和水的器具，如鬲、釜、甗等，而鬻用于加热水则更快、更省能源又方便斟出，是个极具实用性的设计。

此外，分析陶鬻的实用功能还应该考虑到其采用的材质和器形的大小。从现在的出土物看，陶鬻多为夹砂陶所制，但也有部分陶鬻的材质使用的是泥质陶，它们的实用功能应该也有所不同。吕琪昌先生针对良渚文化中的陶鬻提出了他的看法，同时他还发现了体型较小的陶鬻<sup>[10]</sup>。这只能说明，陶鬻可能会有多种用途，而且针对不同的用途，陶鬻所用的材质以及体量都有差异，但从多数情况来看，陶鬻便于加热和斟出液体的实用功能是可以肯定的，而小型的或泥质的陶鬻更可能是液态酒出现后陶鬻功能上的扩展，或者正如吕琪昌先生分析的，是原始陶鬻过渡到青铜爵的产物。

如果陶鬻作为为水加热的器物的推论成立，那么，人们会发现陶鬻的造型与现代流行的电热水壶造型出奇地相似。电热水壶以全新的造型迅速进入了千家万户，方便、安全、快捷、省电，诸多的优点使其深受消费者亲睐。观察其造型，可以发现它

和原始陶鬻有诸多设计上的共同之处：腹部承装液体，底部用来加热，上部有流供液体流出，和流相对的后部有把手用来提拎。二者除了使用的材料不同、加热所用的能源不同，其功能和造型几乎完全一致。时隔几千年，它们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但两者的造型如此相似，能解释这种现象的原因只有一个：它们都是从实用性出发的设计。可以说，西方设计理论在20世纪才提出的“形式追随功能”，中国的原始先民在四五千年前就已经做到了。

## 5 结论

1) 鬻这类器物在原始时期的名称虽无法考证，但其在甲骨文中有明确对应的文字，从字形和器物造型的关系来看，“鬻”这个字形应该是指鬻这类器物，其主要的造型为下部似鬲有中空的三袋足，有腹，细长颈，前有流，后有鬲。

2) 原始陶鬻的造型酷似鸟形，其造型的仿生特点明显，如流似喙，鬲似尾，足、腹、颈也源于鸟形，但它已经是具象仿生发展到抽象仿生的高级仿生“产品”，有些陶鬻还在流两边保留了用圆形泥饼模仿眼睛的造型，这即是它仿生造型的证据，也是它“进化”未完全的证据，因此，陶鬻是中国器物造型史上的一个过渡造型。

3) 在原始陶器中，陶鬻具有相对较复杂的造型和结构，而这种造型直接体现了它的功能，因此，无论是从出现的时间上还是从造型结构上讲，陶鬻都是原始陶器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物，它的造型是原始先民“设计”能力逐渐提高的直接表现。

4) 原始陶鬻的造型和实用功能，与现代生活中普遍使用的电水壶出奇地一致。从时间和空间上来看，这两者应该不太会有借鉴和传承的可能，那么，促成这种一致性的原因只有一个——实用功能。因此，千百年来，材料日新月异，技术飞速发展，但只要实用功能一致，就会出现造型的相似，这也再次验证了造型与功能的关系，用事实说明了何谓“形式追随功能”。

### 参考文献：

- [1] 吕琪昌. 从青铜爵的来源探讨爵柱的功用[J]. 华夏考古, 2005(3): 83-90.  
Lü Qichang. Research on the Function of Jue Tripods from the Origin of Bronze Jue[J]. Huaxia Archaeology, 2005(3): 83-90.
- [2] 吕琪昌. 从史前陶鬻与商代铜鬻的关系探讨夏、商文化的分际[J]. 华夏考古, 1999(1): 36-41.  
Lü Qichang. Research on the Dividing Line Between the Hsia and Shang Culture from the Relation of Prehistorical Pottery Gui and Bronze Jia of the Shang Dynasty[J]. Huaxia Archaeology, 1999(1): 36-41.
- [3] 高广仁, 邵望平. 史前陶鬻初论[J]. 考古学报, 1981(4): 427-459.  
Gao Guangren, Shao Wangping. A Preliminary Study of Pottery Gui-Tripod of the Prehistoric Period[J]. Archaeology, 1981(4): 427-459.
- [4] 吕琪昌. 尉迟寺出土陶鬻的启示[J]. 江汉考古, 2006(1): 38-43.  
Lü Qichang. Pottery Gui from Yuchisi Site[J]. Jiangnan Archaeology, 2006(1): 38-43.
- [5] 吕琪昌. 也说“商”[J]. 东南文化, 2003(9): 78-79.  
Lü Qichang. Th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Shang[J]. Southeast Culture, 2003(9): 78-79.
- [6] 徐中舒. 甲骨文字典[M]. 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 2006: 258.  
Xu Zhongshu. The Dictionary of the Inscriptions on Bones or Tortoise Shells of the Shang Dynasty[M]. Chengdu: Sichuan Dictionary Press, 2006: 258.
- [7] 邹衡.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149.  
Zou Heng. Essays on the Archaeology of the Hsia, Shang and Chou Dynasties[C].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1980: 149.
- [8] 安立华. 陶鬻象形初论[J]. (台北)故宫文物月刊, 1994, 11(2): 112-121.  
An Lihua. The Discussion of the Pottery Gui[J]. (Taipei) the Monthly Magazines of Cultural Relic of the Imperial Palace, 1994, 11(2): 112-121.
- [9] 安立华. 汉画像“金乌负日”图象探源[J]. 东南文化, 1992(增刊1): 66-72.  
An Lihua. The Source of the Image That the Jinwu Carried the Sun on the Back in the Han Dynasty[J]. Southeast Culture, 1992(S1): 66-72.
- [10] 吕琪昌. 青铜爵与良渚陶鬻的关系再议[J]. 华夏考古, 2011(4): 72-78.  
Lü Qichang. Reconsider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Bronze Jue and the Pottery Gui of Liangzhu Culture[J]. Huaxia Archaeology, 2011(4): 72-78.

(责任编辑: 蔡燕飞)

